

Apr. 28
2022

全球治理学科动态
2022年第2期 (总第20期)

全球治理中的 知识生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 (CASS)
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IWEPI)

本期执笔

苏山岳 孟思宇 杨嘉豪 孙振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成果发布
Global Governance Perspectives



专题序言

知识是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当前，知识生产对一国的经济增长、政治发展和国际传播的价值日益显现。中国于 2015 年设立了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本期学科动态以全球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为主题，分析了知识生产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展示了不同地区知识生产的新特点，并且探讨了发展中国家打破西方知识生产霸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本期目录

1. Navnita Chadha Behera,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7, No. 5, 2021.
2. Amitav Acharya, “Race and Racism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odern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8, No. 1, 2022.
3. Ilaria Carrozza and Lina Benabdallah, “South–South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Hegemony: Searching for Africa in Chinese Theories of I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24, No. 1, 2022.
4. Ralph Weber and Silvana Tarlea, “Politics of Immobility: Glob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Study of Europe in Asia,”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9, No. 2, 2021.
5. Rasmus Corlin Christensen, “Elite Professionals in Transnational Tax Governance,” *Global Networks: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ffairs*, Vol. 21, No. 2, 2021.
6. 张涛：《走出“大萧条”：全球知识生产的再平衡》，《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7 期。

本期审校

陈兆源、孙振民



No. 1OXFORD
ACADEMIC**International Affairs****Navnita Chadha Behera***International Affairs***Vol. 97, No. 5, 2021****“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全球化、去全球化与知识生产》**

国际关系学科的诞生距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尽管其研究领域和影响范围不断扩大，但其内在特征仍然是以西方为中心。本文在叙述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时，关注欧洲启蒙运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认知方式”以及创造社会知识的模式，目的是要了解那些根深蒂固但不成文的规则长期以来如何充当了知识生产的“守门人”，并试图解释这一模式为何未能认识到世界各地众多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多样性。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作者在第一部分解释了由启蒙运动哲学家建立的知识生产的结构性原则：在全球化的第一阶段，欧洲的哲学家重新诠释了“何为知识”，推动欧洲思想的普世化，并以西方视角定义何为“文明”，抢先占据了世界知识的话语权。

作者在第二部分解释了上述框架如何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终结后的权力转移中得以维持：由于西方价值体系和认知模式及其根深蒂固的“文明标准”继续塑造着宏大叙事，新独立的国家只有接受西方的“殖民现代性”才能融入国际体系。因此，新独立的国家在建立满足自身需求的社会知识库方面几乎没有自主权。



作者在第三部分试图说明，虽然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扩展了国际关系及其理论的研究领域，但它没有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约定条件（terms of engagement）。作者认为，去全球化为挑战西方知识生产霸权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作者在第四部分使用了两个截然不同但并不相互排斥的例子，试图论证去全球化能够将非西方世界的声音和经验带进国际关系理论界。首先，作者以崛起中的大国——中国——为例，介绍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构建“中国学派”的努力。作者而后以一群折中派学者为例，介绍他们如何通过批判国关理论的去殖民化、扩展国关理论的思想源泉、从世界各地的宇宙观中学习不同的认知方式来对国关理论进行去殖民化。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去全球化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新型国关理论建构路径。

文章的最后，作者对研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虽然去全球化给予国关学界新的发展可能性，但目前尚无法断言，新的民族主义浪潮会否进一步分裂国关理论，或该学科能否成功地重塑自身以反映多元世界。

编译：苏山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2

OXFORD
ACADEMIC

International Affairs

Amitav Acharya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8, No. 1, 2022

“Race and Racism in the Founding of the Modern World Order”**《现代世界秩序建立过程中的种族和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随着 16 世纪西方崛起并主导世界秩序而出现，该秩序首先由欧洲主导，而后由美国主导。帝国和奴隶制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但帝国、奴隶制同种族主义间的共生和相互加强的联系却是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独特产物。种族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它是国际关系学科创立时、二战前西方外交政策辩论中的一个主要问题，但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领先大国和国际关系研究重心，种族主义被掩盖，甚至被主流的学术讨论和政策论述合法化。

本文首先对种族、种族主义和世界秩序等关键概念进行定义：

- 1) 种族。在科学和社会话语中，种族的大多数定义都有争议。建立种族的科学基础曾是西方种族主义的核心。如今，尽管在部分社会和政治信仰中仍然存在着以所谓的智力差异划分种族的思想，但科学已经抛弃了这种思想；
- 2) 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可定义为“基于某一特定种族或族裔群体的成员身份，针对一个人或多个人（通常是少数群体或边缘化群体）的偏见、歧视或对抗”。种族主义不是“简单的偏见”，它还延伸到制度性的信仰、实践和政策中，“这些信仰、实践和政策反映了制度性权力并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
- 3) 世界秩序。一般意义上的世界秩序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世界或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组织方式。



本文随后考察了世界秩序同帝国、奴隶制之间的密切联系。作者特别指出，种族主义同帝国、奴隶制在现代世界秩序的建立过程中深刻融合，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概念性“发明”。作者在此反对西方学者的一种观点，即欧洲列强推动的帝国主义世界秩序以及其中的种族主义随着美国霸权崛起而终结。作者认为，在美国，奴隶制不仅助长了种族主义，还推动了这个国家崛起为世界强国。

本文还考察了反对种族主义和要求种族公平如何成为二战前后反殖民主义运动倡导的另一种世界秩序的关键组织原则。作者认为，后殖民国家的一项重大贡献就是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以及在非殖民化和人权之间建立内在联系，不过，这种联系在现代世界秩序的两个最重要的基础——《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是模糊的。此外，作者主张密切关注种族主义在知识生产中与在实践中的深层共生关系，以及特别关注认知群体和个体代理人的作用。

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强调，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国际研究协会（ISA）等专业学会需要将种族和种族主义作为一个主题，而不是仅仅将其纳入多元化或更笼统的口号之中。在学术讨论和政策论述中，将种族主义边缘化的做法不仅在道德上是错误的，还将阻碍旨在带来变革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对种族和种族主义的研究可以促进政策讨论、说明在 21 世纪的世界秩序转变中可能需要怎样的新规范和新机构来满足对正义和平等的要求。

编译：孟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3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academic.oup.com/isr**Ilaria Carrozza and Lina Benabdallah***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 24, No. 1, 2022****“South–South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Hegemony:
Searching for Africa in Chinese Theories of IR”****《南南知识生产与霸权：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寻找非洲》**

南南知识生产有助于挑战国际关系理论中传统的知识霸权。作者在文中发现，全球南方视角或许能成功地将国际关系理论去中心化，并且产生不同于排外和异化关系的知识生产方式。

文章首先总结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全球南方有关的三个关键限制，这些限制的存在促使许多学者呼吁采用后西方/非西方视角：

- 1) 把欧洲国家作为评估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理想类型和标准，使欧洲的殖民实践和国家形成过程正常化；
- 2) 由于殖民遗留问题，发展中国家通常作为数据收集和经验观察的场所，为知识生产提供原材料，自身却是“理论的真空”；
- 3) 西方学界同发展中国家学者开展数据合作和建立伙伴关系的伦理问题。

作者进而发现，尽管国际关系学界在理论的去中心化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一个机构、一位学者或一份出版物位于全球南方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就是从全球南方的角度从事研究。另外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一些学者和机构虽然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南方的视角，但他们的知识训练可能是在全球南方之外获得的。因此，作者在承认南北二元对立的异化关系产生认识论霸权和知识生产



等机制的同时，也主张应该超越简单的南北二分法，并提出知识生产中的“内化”，即基于相似性而非差异性、对他者进行包容而非排斥。

最后，作者研究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非洲的研究。具体而言，作者考察了 2010~2020 年间中国学术期刊发表的与非洲相关的国际关系论文，发现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描述全球南方的过程中拥有多种视角：既有学者反击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学者对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加以运用。作者还注意到，不少学者在研究非洲时将其描述为一个单一的实体，并且偏重于从整体层面讨论中非关系，重视中国经验与非洲关联性。作者试图以此说明，全球南方国际关系学界在产生一种新的包容和内化的知识生产方式。

编译：杨嘉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4



Ralph Weber and Silvana Tarlea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59, No. 2, 2021

“Politics of Immobility:**Glob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he Study of Europe in Asia”****《流动性不足的政治因素：全球知识生产和亚洲的欧洲研究》**

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但亚洲的欧洲研究却缺乏知识的流动性。本文旨在探寻亚洲视角下的欧洲研究，在回顾相关文献并对西亚、中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欧洲研究学界开展访谈的基础上，从三个层次分析亚洲的欧洲研究为何缺乏知识流动性：

- 1) 学术背景下亚洲的欧洲研究现状；
- 2) 学术之外的经济、政治利益如何塑造亚洲的欧洲研究；
- 3) 政治竞争背景下亚洲的欧洲研究。

在主流的欧洲研究国际会议上，与会学者往往来自欧美国家，缺少其他国家的欧洲研究者。不过，亚洲并不缺乏欧洲研究基础，部分科研院所开设欧洲研究的研究生课程，并有专门机构出版欧洲研究的学术期刊。马丁·霍兰德（Martin Holland）在《亚洲的欧洲研究》（*European Studies in Asia*）和《欧洲研究在亚洲的未来》（*The Future of European Studies in Asia*）两本著作中详细分析了亚洲的欧洲研究情况：欧洲研究在亚洲始于二战后的日本，随后传播至中国、韩国、泰国等国。亚洲不同国家的欧洲研究是有差别的。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被霍兰德盛赞为欧洲研究的亚洲旗手，而东南亚其他部分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的学术重心



则偏向研究美国或其他区域大国。作者发现，亚洲的欧洲研究存在地域偏见，欧洲研究在中亚和西亚的关注度远低于东亚和东南亚。此外，亚洲的欧洲研究似乎只在单个国家层面运作，并不参与全球欧洲研究的辩论。亚洲的欧洲研究还表现出不连续性：研究项目往往在欧盟暂停资助研究后的一段时间内停止产出成果。不过，也有部分机构在欧盟退出后依旧保持研究活动，这在中国有很好的体现。

立场在亚洲的欧洲研究中非常重要。亚洲的欧洲研究不仅涉及学术，还涉及政治因素。欧盟作为亚洲的欧洲研究的最大支持者，自然希望亚洲学者更多地将研究重心放在欧洲一体化上，但亚洲学者偏向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定义欧洲研究，而不只是欧盟研究。欧盟在亚洲促进欧洲研究希望增加相关知识的流动性、推进软外交，但这可能过于政治理想主义。亚洲的研究者接受资助并开展欧洲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推动本国同欧洲的贸易。中国对欧洲研究的态度则是希望通过研究欧洲来解决中国问题，为此，中国政府通过智库开展相关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中国部分学者曾接受过欧盟资助，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欧洲研究更为复杂。

本文指出，亚洲的欧洲研究表现出有限的知识流动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研究的不连续性、欧盟的推动力等。欧洲研究依旧不是一门全球化的学科，因为许多知识仍未进入知识共享的网络中。在亚洲研究欧洲不仅涉及一系列不同的立场，还会涉及各种经济利益和政治议程。有必要将现有欧洲研究中关于历史和社会学的部分扩展，超越对当前知识生产中心的关注，以拥抱更为全球化的视角。

编译：杨嘉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5



Rasmus Corlin Christensen

Global Networks: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ffairs

Vol. 21, No. 2, 2021

“Elite Professionals in Transnational Tax Governance”

《跨国税收治理中的专家》

专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不亚于政治家，他们对治理规则的形成发挥关键作用。不过，相关研究对该群体的关注仍有盲区：把专家群体视作内部一致地为治理事业贡献智力支持，忽视了他们在影响治理政策时存在权威差异和声望竞争。本文以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治理专项为例，借助“互联生态（linked ecologies）”路径和“职业分析（career analysis）”方法研究跨国税收治理中的专家群体，发现专家们在职业资源和网络位置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在专业权威和竞争策略上的差异，并进一步塑造了治理过程。

互联生态描述的场景是，围绕某个议题存在众多相互联系且彼此竞争的集团。在跨国税收治理中，专家们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在竞逐议题话语权的过程中共同构成互联生态。互联生态路径以网络化的视角观察专家群体，但区别于“知识网络（knowledge networks）”等路径，强调专家集团之间乃至专家集团内部基于异质性的互动。

职业分析指对曾参与 BEPS 项目的专家的职业生涯进行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初步分析发现，在学术、财会、行政、税法、转移定价等职业领域中，从事过税法职业的专家占据多数；在学术机构、国际组织、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等职业部门中，在私营部门工作过的专家占据多数。在此基础上，作者应用最优



匹配 (optimal matching) 和聚类分析 (cluster analysis) 归纳出四种典型职业路径 (model pathways):

- 1) 转型主管 (Adviser-turned-executive), 指担任行政主管前从事过顾问工作, 在特定的领域中建立起广泛的知识基础、关系网络和管理经验;
- 2) 专业掮客 (Expertise brokers), 指曾在多个职业领域和职业部门任职, 既在公家做过管理者、也在民间做过被管理者, 从而建立起横跨多个领域和部门的技能和人脉;
- 3) 税法专家 (Tax law specialists), 指在私营部门长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 在复杂的议题特性以及特定的职业报偿结构中高度专业化;
- 4) 税务天才 (Talents), 指入行时间较短但较快掌握大量职业资源。

BEPS 项目对法律知识的要求极高, 因此税法专家在治理过程中享有高度的权威。当然, 仅仅具备专门性的权威还是不够的。税法专家还借助专家网络推动自身观点“社会化”, 即联系其他专家在不同的职业领域和职业部门巩固并传播政策主张。这些优势使税法专家相比其他类型的专家同 OECD 的决策者们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与之相比, 那些缺乏法律知识及网络资源从而在政策制定中缺乏权威的专家则不得不借助其他专家的权威来影响政策, 或直接淡出治理过程。

本文初步展示了生态路径如何用于解释跨国税收治理中专家的角色与行为, 提示出一点重要的现实启发: 如果在治理过程中想尽可能地做到“兼听”“综采”而不是集中于一小部分专家, 就要考虑如何越过专家群体的职业路径和权威等级所设置的障碍。不过, 本文对职业资源的界定尚不够清晰, 也对专家群体的竞争机制分析不足。特别有待进一步阐释的是, 不同专家在不同条件下是如何利用职业生涯中形成的网络资源进行声望竞争的。

编译: 孙振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No. 6



探索与争鸣

张涛

《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7 期

《走出“大萧条”：全球知识生产的再平衡》

距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余年，但全球经济仍未完全走出其所带来的阴影，世界仍处于相对缓慢的增长路径上。本文试图探讨国家间在科学贡献上的不平衡对于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作者指出，受国家间基础科学交流及移民推动技术传播的影响，基础科学较为落后的国家能够搭上先进国家技术外溢的便车、利用新技术推动新产业形成。但受制于边际递减效应，国际上会出现旧产品供给过剩、新产业形成缓慢并陷入长期停滞的情况。作者认为，基础科学较为落后的国家应逐步承担更多基础研究责任，促进世界加速恢复技术进步、提高新产品创造能力，从而尽快走出衰退。

本文引入关于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和制造基础的全球制造分工决定框架，在此基础上分析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的内在不平衡及其影响，然后借助国家间知识生产、知识资本化的不平衡来分析全球危机的起因及走出路径。

作者首先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制造业的分工。知识生产是与研发相关的活动，是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所累积的知识存量。其中，基础研究是创新的基础，应用研究则是针对某一特定目的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造、寻求满足特定需要的方法。基础研究对于应用研究至关重要，应用研究依赖基础科学取得的研究成果。知识资本化是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催生新行业的过程。知识生产是新产品开发的基础，产品开发则在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将想法进一步转化为新产品、实现商业化。



知识生产和知识资本化过程中的内在不平衡包括三个方面：

- 1)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不平衡。基础研究能够拓展知识前沿边界、促进创新，但同时也不可忽略应用研究，否则将严重阻碍知识的应用以及相应的产业化进程；
- 2) 知识生产和知识资本化的不平衡。知识生产最终必须要通过知识资本化来实现落地并形成产业；
- 3) 国家间知识生产与知识资本化的不平衡。国家间须实现知识生产与知识资本化的平衡，否则将会影响世界范围内的增长周期。

作者从两方面展开知识内在不平衡的宏观经济效应：内在不平衡的短、长期增长效应，以及知识生产再平衡与走出通货紧缩。应用试验与基础研究的支出不平衡会严重影响短期和长期的增长效应。而对于通货紧缩，作者提出要增加基础研究支出，解决好知识生产再平衡问题，通过新旧产业再配置走出通货紧缩。

作者最后选取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美两国的知识生产和产业化为例，论述了知识生产与知识资本化的不平衡及其应对。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的基础研究极为发达，再加上对新科技应用的敏感度非常高，以及银行在德国的工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德国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业基础。同时期，美国的基础科学比较薄弱，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但在知识资本化方面，美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充分利用本国的市场规模优势，以及利用规模经济降低制造成本，形成了工业化大众消费时代。美国不断地将欧洲新技术应用到生产领域，并利用规模优势保持竞争力。多种门类的重工产业利用行业间相互关联的网络效应协力发展，逐渐取得世界制造业龙头地位。战后美国在科学领域取得了绝对领导地位，西方世界呈现一极（美国）多寡头（西方伙伴）局面，对促进全球总体需求扩张起到了积极作用。



作者认为，大萧条的产生和延续具有类似的逻辑：全球化过程中知识生产和知识资本化的不平衡导致产能过剩以及由此带来的通缩压力。国际基础知识生产相对稀缺。后发国家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小国的基础研究投入较低，导致长期产能过剩且不利于贸易条件提升。对此，全球要走出当前的长期停滞需要做四件事：

- 1) 在知识生产上更加重视基础科学，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 2) 知识资本化需要提供良好的市场制度以促进新产业形成；
- 3) 全球要积极为面向未来的新产业做好准备；
- 4) 各国充分发挥本国优势，在产业链上更多形成互补，携手共享全球增长中的福利。

编辑：孟思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声明：对观点的摘录和引用不代表编者本人及其所属单位对观点的认同。

全球治理研究团队

任 琳 熊爱宗 鲁 桐 吴国鼎
陈兆源 黄宇韬 韩永辉 宋 锦
刘 玮 沈 陈 田 旭 彭 博

研究助理团队

兰馨彤 苏山岳 孟思宇 杨嘉豪 孙振民

